

红色收藏

送往前线的太原「宝塔」



不锈钢宝塔(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藏)

在那个火红的年代，钢花飞溅的不只是金属的光泽，更是一个民族工业自强的希望。

1952年9月16日，太原钢铁厂电炉车间的工人们屏息凝神，注视着新中国第一炉不锈钢水缓缓流出。这炉牌号为2Cr13的钢水，结束了中国不能自产不锈钢的历史，在抗美援朝的烽火岁月里，具有非凡的意义。

喜悦洋溢在每位太钢人的脸上。他们用这炉具有历史意义的钢水铸造了一座高约20厘米、银光闪闪的宝塔模型，向党中央报喜。这座宝塔以延安宝塔为原型，不仅因其是革命的象征，更寓意着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的自力更生精神正在新中国建设中开花结果。

然而，这座满载喜悦的宝塔并未直接抵达北京。当时，抗美援朝战争正处在关键时期，党中央决定将这座不锈钢宝塔转交旅顺苏军战利品陈列馆，向前线志愿军将士展出。当战士们看到这座象征祖国工业成就的宝塔时，倍感振奋。

当时，太钢的工人们提出了“工厂就是战场，机器就是武器”的口号，将抗美援朝与生产竞赛紧密结合。在捐献“太钢号”战斗机的爱国运动中，太钢职工提前一个月完成了捐款计划。而前线的战士们则从这座不锈钢宝塔中，看到了祖国工业的进步，更加坚定了战斗意志。可以说，工业战线与军事战线共同构筑起保家卫国的钢铁长城。

这座不锈钢宝塔在旅顺展出25年后，于1977年随其他文物一同移交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珍藏。而它的仿制品则陈列在太钢厂史展览馆中，继续向人们述说着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这座小小的宝塔，凝聚着太钢工人在抗美援朝时期产业报国的赤子之心，也映照出志愿军将士保家卫国的钢铁意志。它不仅是新中国工业发展的见证，更是中华民族在艰难岁月里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象征。

青玉剑彘

岳 娴



青玉剑彘(太原市博物馆藏)

在太原市博物馆的众多珍藏中，有一件明代青玉剑彘，长4.6厘米、宽2.6厘米、厚1.8厘米，通体泛着褐黄色的皮色，表面以浮雕技法装饰着螭龙纹，背面还有一个矩形的系带孔。

“剑彘”是古代玉具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镶嵌于剑鞘上的玉件，用于随身佩戴。古人佩剑，不仅是防身兵器，更是身份与礼仪的象征。一套完整的玉具剑包括剑首、剑格、剑彘和剑珌，而剑彘正是其中用于穿系腰带、固定剑身的关键部件。它通常被精心雕刻成各种纹样，除了螭龙，还有禽鸟、云纹、谷纹等，造型别致，工艺精良。

这件青玉剑彘以青玉雕琢而成。青玉属于和田玉的一种，质地温润、色泽深邃，自古就受到人们的喜爱。古人认为玉能体现德行，因此有“君子比德于玉”之说。以青玉雕琢剑彘，不仅出于美观，也蕴含着古代贵族对品德与身份的自我要求。

仔细看去，这件玉剑彘上的螭龙纹线条流畅，形态灵动。螭是古代传说中的无角龙，常用于装饰剑具，以增强佩剑的威严与仪式感。而它背面的矩形孔洞，可以将革带从此穿过，从而将剑稳固地系于腰间。

如今，这把剑已无处寻觅，但玉剑彘仍存。它从历史中走来，带着工匠的巧思和岁月的沁色，成为我们连接古代文明的一个细腻触点。

墨痕深处自有惊雷

任志聪

《五峰山草书碑》是傅山书法的重要代表作，也是傅山书法的一座高峰。通观碑文，字相怪僻，阅读生涩，就自由奔放连绵缠绕的线条而言，若说是草书，又并非唐人《书谱》的草法；若说是行草，字体的连带和虚实关系，又超出了一般的行草印象，一反传统草书简省的符号特点，反其道而行之，多以行书字体化繁为繁，并融以道家符号的笔触，剑走偏锋，形成了傅山独有的草书风格。故后人将他的这种草书，称之为“龙蛇大草”，以示与传统草书的区别。

书诗之辨

“五峰山草书碑”最早立于清朝时期，当时傅山因伤滞留寿阳，留下墨宝，当地名流刘震获手迹后，勒石于寿阳五峰山龙泉寺。20世纪80年代末，修建太原碑林公园时，复制一通立在园内。此后，习惯上被称为《五峰山草书碑》。

《五峰山草书碑》的“索书”者，姓郝名鉴盘，又名旧甫，字新养，是傅山的世交。明亡后，傅山曾携母避难住在寿阳郝家。后又入道寿阳五峰修行，在师父郭敬中去世后离开。一别30年，古稀之年的傅山再游山西平定、寿阳，骑毛驴在罕山失足坠落摔伤，就近去了寿阳郝家养伤。其间，郝送来绫布“索书”。

上世纪80年代末，《五峰山草书碑》一经发现，就引起山西书坛的震撼，并引发对傅山书法的研究热。尤其对《五峰山草书碑》是先有书法，还是先有诗的问题进行过争论，但当时因主观的局限性，一度认为《五峰山草书碑》碑文，是傅山抄录了他曾作过的一首诗。

而今细读清人编纂的傅山诗文集《霜红龛集》卷七收录的碑文诗——《题书自笑八韵》，以及后来发现的山西博物院收藏傅山《题书自笑八韵》的诗文手稿，结合碑上的附记，可以推想：作者应该是即兴即景完成“索书任务”之后，再补记抄录了诗稿。

山西博物院藏的傅山《题书自笑八韵》手稿，与《五峰山草书碑》碑文的内容略有差异，因此有人认为手稿是伪作，这篇手稿并不起眼，作伪有什么意义？假设山西博物院藏品为真迹，以现有碑文和藏品手稿对比，碑文明显比手稿用词准确和工整。故猜想傅山这个手稿，是据朋友“索书”写作过的一首诗。

的第一个条幅所记。之后，他觉得内容不太满意，又修改写下了第二幅，也就是碑刻的内容。

再者，现有《五峰山草书碑》、山西博物院所藏傅山《题书自笑八韵》手稿，以及《霜红龛集》卷七收录的碑文诗，三处附记，同一索书人，名号却不同，又有“书以自顾”之句，也可印证是先有书法之作，然后有诗文。

碑文释读

傅山将论书作为“索书”的内容，或许是养病时与朋友一起讨论的话题，抑或是自己一直以来的关切，即兴书写时已打好腹稿。

擎原罗鹭拙，腰复坠驴疼。

手腕原就有疾（擎是指手腕），像网中的野鸭子被困一样笨拙和不灵活；不久前骑驴外出，又从驴上掉下来，摔伤的腰还在隐隐作痛。手腕和腰是书法用笔的关键，但这时傅山却受病痛的折磨。

不谓中书管，犹如雁春。

不要说毛笔（中书管）使用有什么神秘，就像“雍父春”春来一般，一上一下，靠手与手腕的协调动作来完成。用笨拙的“雍父春”，形象地比喻毛笔使用的关键在一起一倒的提按动作。

水光财一画，花颜又双彰。

洁白绢线的线条还闪着墨汁的水光，才写少许笔画（古文才与财通用，一上一下的意思），眼里就出现了重影。说明眼力对书写的重要的影响。

断续团圆构，树权艾纳松。

用钩树和松树杈的生长形势和盘结形状，比喻书法的笔画线条间的断续和叠进关系。断续，书法有“笔断意连”的法则；线条叠进，有唐代书法家陆柬之如松之节节加劲的笔法。

三杯忙上顿，一觉未疗邛。

书写前吃饭饮些酒（“三”字应言喝得多），又睡过一觉，希望能养足精神，但身体病痛并未减轻。叙述当时书写状态不好。

回顾奔驰兽，旋骇竹木龙。

酒精刺激的作用，带来些小小的灵感，回望所作字，有的如奔驰的兽，有的如惊骇的竹木龙，在纸面上奔腾舞动。形象化地强调书法的关键在“字活”和“灵动”。

为怜痴有嗜，能苦菜为僧。

为了自己的嗜好，书法作为精神和生活的双重寄托，傅山以卖菜般低廉的价格，出售书法这种清苦的“劳役”。似乎在揭示，写好字，必须能吃苦并下一番工夫。

若作神符镇，差消鬼市喀。

看着绫布上叠叠层层、弯弯曲曲的字迹，多像道教的符篆啊！若将它作为镇鬼神符，遣往峪山镇住鬼市的恶鬼，也是功德一件了。诗到最后，作者跳出书法认知，思想的境界又一次提升，从关注书法转向关注社会。

书文欣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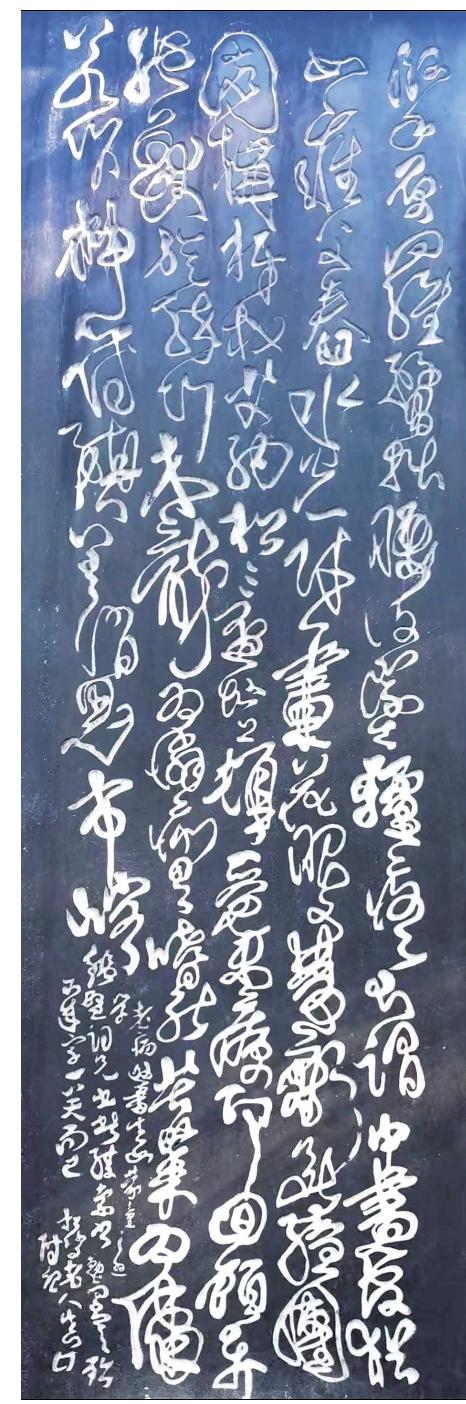
历来优秀的书法作品都是与典型的内容和丰富的情感交相辉映的。如王羲之的《兰亭集序》、颜真卿的《祭侄文稿》、苏轼的《寒食帖》等，都是书文相得益彰。观《五峰山草书碑》亦是如此。

傅山一生历经明清两朝，38岁以前，他安心读书做学问，研究经史子集；38岁以后进入清朝，他不得不出家入道，生活清苦。70岁的傅山又来到了寿阳，在朋友“索书”的文思中，他可谓百感交集。

《五峰山草书碑》所表现的主题是深刻的。内容似乎是在讲书法，但借用连绵线条的道家意趣，暗含了正义之感。碑文似在意无意之间，映射了“道士坠驴”的历史故事。但此“坠驴”非彼“坠驴”。老道士陈抟坠驴，是讲赵匡胤登极，天下太平。而此刻傅山的坠驴，却是复明希望破灭，天下大势趋向清朝，难免内心伤感，他只能以神来之笔汇集字相，组成了道家的镇鬼神符，希望能镇住峪山鬼事乃至人间魔鬼。

《五峰山草书碑》在书法艺术的表现上更是别具一格，他不仅融入道家符号，更表现了强烈的个性和反传统。他改造草书简单的特征，适当繁化相关字体，甚至主笔虚笔连带不分，一笔数字连绵不断，形成自己的独特书风。通篇气势连贯，字法奇崛，结体奇特，构成一种奇险狂放、磅礴夺人的开合效果。

《五峰山草书碑》镌刻着傅山疾恶如仇自由奔放的人格。在笔墨间倾注了风骨幽奇的道家精神和忠孝节义的儒家风范，并达到了无滞无碍、灵通透脱的超然境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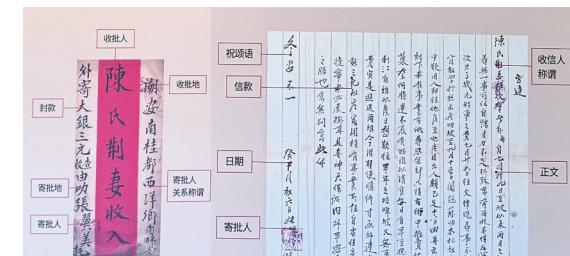
《五峰山草书碑》(作者供图)

以情为魂 以信为骨

钩 希



晋商汇票



侨批格式

票靠印章防伪和生效，小小的印章既是取款的凭证，也是票号对其信用的承诺。

展览的巧妙之处在于“以物叙事”。一枚刻有“汇通天下”字样的印章，见证了晋商票号纵横四海的过往；几张华侨登记证则记录了游子下南洋的奋斗史。这些实物背后，是南北商群虽地理相隔，却共同遵循的“信义为骨、创新为魂”商道基因。尤为动人的是，一封破损后精心裱褙的侨批，寄信人因战乱与家乡失联十年，仍坚持委托同乡带回家书与积蓄。这种执着与晋商身股制契约中“银股与身股精确到毫厘”的严谨，共同勾勒出中华商道中超越时空的担当。

将侨批展览放在晋商博物院举办，不仅是一次跨越地理的深度对话，更是一场金融文化的深度融合，不仅让我们得以窥见“纸短情长”背后深沉的家国情怀，也让我们感受到“汇路绵延”中蕴含的智慧与信义。

(本文图片由作者拍摄，为该展展板内容)

在山西博物院展厅中，陈列着一件来自春秋时期的珍贵文物——王子于戈。它不仅是一件冷兵器，更是一扇通往那个诸侯争霸、文化交融时代的窗口。

王子于戈出土于万荣县后土庙，整体呈现出典型的春秋时期青铜戈的形制。戈的前部称作援，后部称为内，戈援和戈内两部分常由侧阑相接。戈援包括上刃和下刃，以及上下刃之间突出的脊。戈援下刃靠近侧阑处呈弧状弯曲下垂的部分称作胡，戈胡上靠近侧阑的地方开孔为穿，用来捆绑绳，就是木柄，使戈与木柄结合为一件可以挥舞使用的武器。王子于戈胡上可见长方形三穿，援身上扬，十分优美。

这件戈最令人瞩目的，当数其精美的错金鸟虫铭文。错金工艺是春秋时期一种高级的金属装饰技法，工匠们先在青铜器表面刻出铭文的凹槽，然后将金箔或金丝嵌入其中，再进行打磨，使金与青铜表面浑然一体，金光熠熠，尽显华贵。戈的一面有错金鸟虫书铭文一字，尚未识别出具体内容。另一面的错金鸟虫书铭文则清晰可辨，为“王子于之用文”。

据考证，“王子于”就是吴王僚即位前的称谓。吴王僚是春秋时期吴国的君主，在他统治时期，吴国的势力不断发展，与周边的楚、越等国既有冲突，也有交流。这一铭文明确了戈主人的身份，使其成为研究吴王僚乃至吴国历史的重要实物资料。

鸟虫书，又称鸟虫篆，是春秋中期至战国时期盛行于吴、越、楚等南方诸国的一种艺术化金文字体。它的独特之处在于，在文字的笔画上添加鸟、虫、鱼等形态的装饰，将文字与绘画艺术巧妙地融合在一起。

王子于戈是吴国军事与政治的一个缩影。春秋时期，吴国凭借着强大的军事力量，在诸侯争霸中占据一席之地。青铜戈作为当时主要的兵器之一，其制作工艺和装饰水平，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吴国的国力与工艺水平。



王子于戈(山西博物院藏)

这颗“香菇”是陶拍

郭 悅

秋天是采蘑菇的好时节，但在博物馆里若见到这种形似香菇的物件，可千万别流口水。这是一件来自马桥文化的珍贵文物，珍藏在苏州博物馆，距今已有近4000年的历史。



香菇与红陶拍(苏州博物馆藏)的对比

史，与中原的二里头、二里岗文化时期相当。这件红陶拍似“红伞盖、白杆杆”的菌类，实为江南先民制陶的重要工具。

陶拍主要用于修整陶器表面，可分为两类：光面陶拍如“去纹除皱”，能平整坯体；带纹样的陶拍则如“上妆”，能在陶器表面印出绳纹、方格纹等装饰。

陶拍的造型并非只有“香菇”一种。古人制陶时，为加固坯体、使其表面光滑，会使用陶拍反复拍打。随着工艺发展，逐渐出现了绳纹、格纹甚至虎形、鱼形等特殊造型的陶拍。

马桥文化以上海马桥遗址为代表，是青铜时期的重要区域文化。虽在时间上晚于良渚文化，但二者并无直接承袭关系。马桥文化的形成既受本地环境影响，也吸收了中原文化的元素，印证了中华文明多元交融的特点。